

盘龙城商代“铜饰件”辨析*

井中伟

(吉林 长春 1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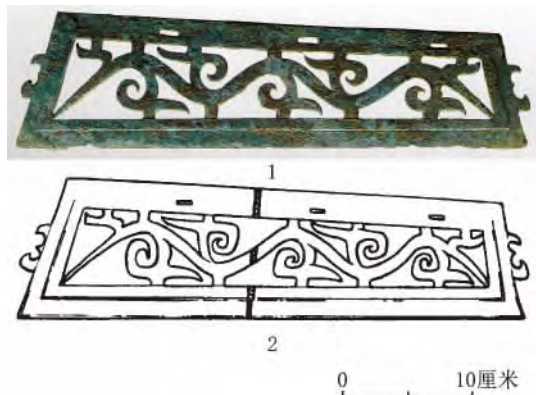
摘要: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群是一座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由商王朝直接设置和控辖的早商城邑,出土了大量的各类遗物。本文以埋葬环境、形制类比和文化背景为线索,重点对杨家湾 PYWM11 出土 2 件所谓“铜饰件”的功能与定名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认为它们应定名为“刀”,是一对具有军权礼仪功能的兵器。此类梯形大刀虽与卷首刀同时出现,但并未像卷首刀那样持续延用到西周前期,似乎仅是昙花一现。

关键词:盘龙城遗址;铜刀;青铜兵器;商周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5.8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7)03-0076-07



图一 盘龙城杨家湾M11出土“铜饰件”

1.PYWM11:1 2.PYWM11:33

盘龙城遗址群地处长江之滨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自1963年以来,这里不仅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护城壕以及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外还有高级贵族和普通民众的居住址、墓葬区以及手工业作坊等^[1]。现已确认,盘龙城商城是一座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由商王朝早期直接设置、控制和统治南方的“直辖邑”^[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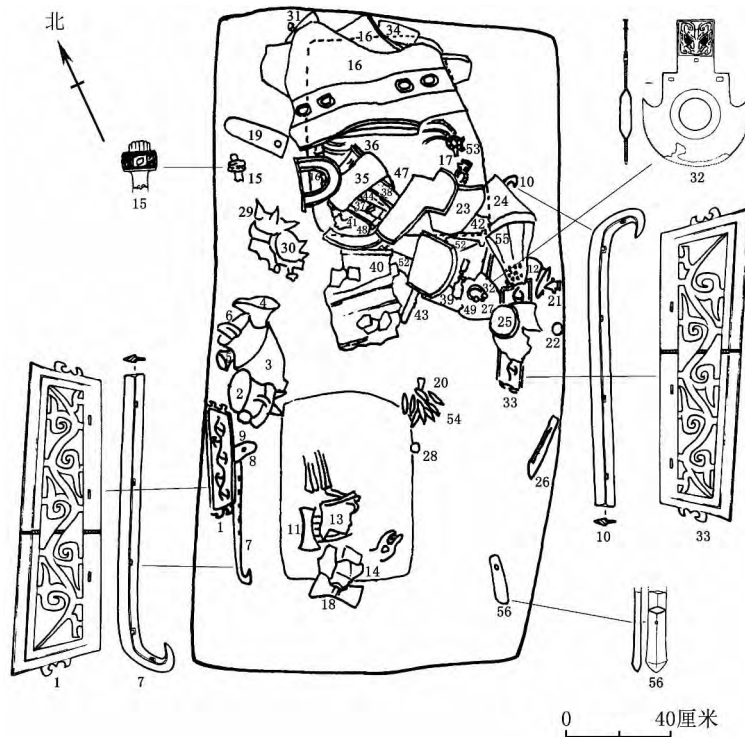
盘龙城商城出土了大量的各类遗物,其

中有两件铜器(PYWM11:1、33)极为特别,它们形制基本相同,整体呈扁平的长梯形,上窄下宽,上部有三个基本等距排列的长方形穿孔,下部为平直刃。器身中部镂空出上下两排的回首龙形图案,上排2个,下排3个,错落排列,龙身作波浪状,图案四周呈带状微凸构成边框。左侧比右侧宽,两侧边缘均有反向的“3”字形扉牙。全长40、宽10.1、厚0.3厘米,重0.85千克(图一)。因不明其具体用途,考古报告含糊地称为“铜饰件”。在次年出版的图录中虽定名“青铜构件”,但同时指出“用途及名称皆不明”^[3]。当然,也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其功能应与刀类近似——虽然未必为实用器”^[4],但并未展开讨论。十余年来,这两件铜器再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以埋葬环境、形制类比和文化背景为线索,对其用途及名称试做探讨。

一、埋葬环境考察

这两件所谓的“铜饰件”,于1989年冬出自盘龙城商城北部的杨家湾PYWM11。该墓

作者:井中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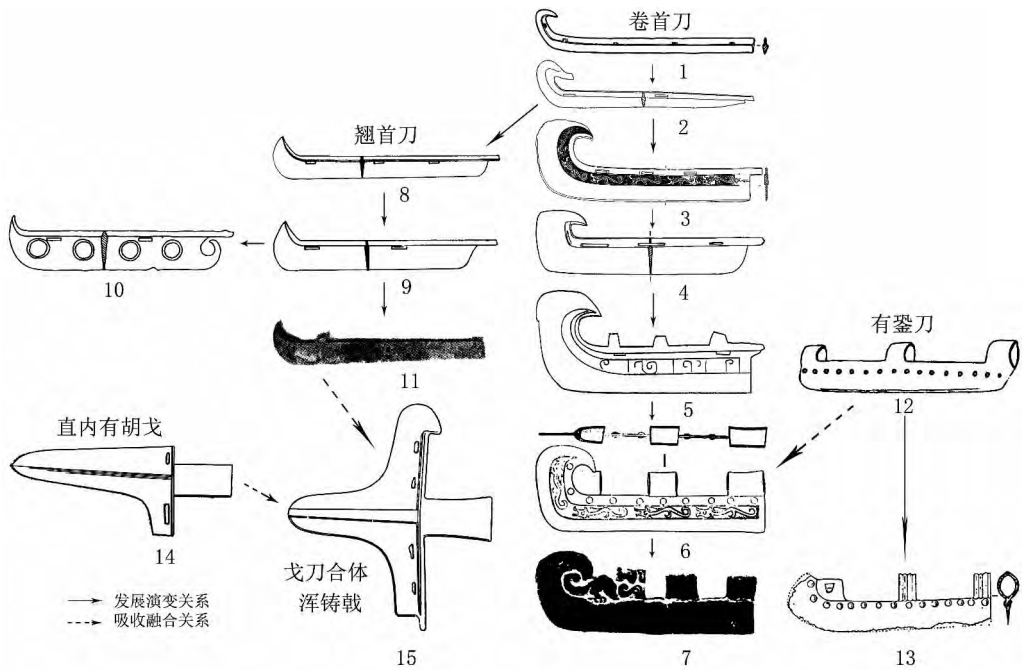
图二 盘龙城杨家湾M11平面图

1、33.铜饰件 2、30、31.铜弧腹罍 3、25、34.铜尊 4、6、57.铜弧腹爵 5.铜弧腹觚 7、10.铜勾刀 8、19.石铲 9、22、28、53.陶饼 11、18、51.铜细腰觚 12.陶侈口簋 13.铜簋 14.陶罐 15.铜镢 16.铜鼎 17、27、49.绿松石饰 20、26、45.玉斜刃柄形器 21、42.铜直内戈 23、24.陶埴圜 29.铜折腹罍 32.铜钺 35.铜斤 36.铜斧 37.铜凿 38.骨匕 39.铜戮 40.陶折肩瓮 41、46.铜铎 43.玉戈 44.铜矛 47.铜直背刀 48.铜无翼镞 50.铜折腹爵 52.石戈 54.骨镞 55.卜骨 56.铜铸(5、46、50、51、57压于其他遗物下;采自《盘龙城》第265页图一九五)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口遭到破坏，南北长2.5、东西宽1.4米，根据葬具朽痕判断，墓中棺椁齐备，均雕花彩绘。墓底南北两侧各有一个殉狗坑，坑内各埋狗一只，身体蜷曲，头向相反，但面向均朝东北。墓坑中未见人骨架，但在墓底中部发现一个有盖陶瓮，瓮内有较多骨渣，有的骨渣一面白色，一面黑色，推测墓主可能属于二次葬，人骨被置于陶瓮之中。随葬器物包括觚4、爵4、罍4、尊3、鼎1、簋1等礼器，钺1、戈2、勾刀2等兵器在内的青铜器以及陶、玉、石、骨器，共计57件^[5](图二)。根据陶器和青铜礼器形制特征，该墓被归入报告划分的“盘龙城七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二期晚段”。这一年代判定基本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认同^[6]。

从墓葬平面图上观察，“铜饰件”分别放

置在墓内东、西两侧。标本PYWM11:1位于墓内西南部，似乎叠压在7号铜勾刀和8号石铲之上，与之紧邻的还有9号陶饼以及略偏北处的一组青铜礼器(2~6号分别为罍、尊、爵、觚、爵)。标本PYWM11:33位于墓内东侧中间，被压在25号铜尊下，其下似乎叠压着12号陶簋和32号铜钺，铜钺下又叠压着10号铜勾刀，与之紧邻的还有21号铜戈、22号陶饼和55号卜骨，至于27号和49号皆为绿松石饰，它们位于32号铜钺中心大圆孔的边缘，很可能是用于装饰铜钺的镶嵌物^[7](图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号、33号“铜饰件”刃部相背朝外，且分别与7号、10号铜勾刀配套，成对竖向摆放于墓内，表明它们应具有某种特定的礼仪象征。鉴于它们存在着相似的功能，这里有必要先来分析一下铜勾刀。



图三 卷首刀演变关系示意图

1.黄陂盘龙城PYWM11:7 2.西安老牛坡临72·929 3.安阳花园庄M54:80 4.安阳郭家庄M160:59 5.青州苏埠屯M8:53 6.安阳殷墟西区M1713:94 7.洛阳林校C3M230:99 8.淳化黑豆嘴M1 9、10.淳化黑豆嘴M2 11.麟游蔡家河出土 12.延长张兰沟出土 13.昌平白浮M2:24 14、15.宝鸡斗鸡台A8(2.采自刘士毅《老牛坡》第41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10.采自《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11.采自《考古与文物》1991年1期;12.采自《考古与文物》1994年2期;13.采自《考古》1976年4期;14、15.采自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242页,北平,1948年)

这两件铜勾刀(PYWM11:7、10)形制基本一样,刀身作窄长条状,背部收窄形成侧阑,双面刃,刀锋上卷呈回首钩状,背上沿侧阑分布有五个小方形穿孔,全长40.8、刃宽1.4、背厚0.7厘米^[8](图二7、10)。目前所知与之同类的铜刀数量并不多,但由于它们多出土于高规格的铜器墓中,且常与象征军事权力的铜钺共存,因此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有的称为“有穿刀”^[9],有的称为“卷头刀”^[10],还有的称为“长体卷锋刀”^[11]。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梳理出此类铜刀的主要特征:1.卷首刀的形体长,全长多在三、四十厘米,短者不少于23厘米,最长者达80厘米^[12]。刀锋勾卷,刀背有穿或有銎,需要安装长柄才能使用,金文中多有此类铜刀的象形字^[13]。2.卷首刀的年代明确,自商代二里冈上层时期出现,主要流行于晚商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已基本不见。它们发展演变序列清楚,总体表

现为刀身由窄变宽,勾卷的刀锋由圆转到方折,装柄方式由背上开穿到增设脊状内,再发展为以銎代穿。具体来说,约殷墟文化二期时,卷首刀派生出翘首刀;为了更好地固柄,殷墟文化四期时刀背上出现脊状内;商末周初时,受北方系有銎刀的影响出现以銎代穿的卷首刀,大约与此同时,周人开始将翘首刀与直内有胡戈相结合,创制出具有军事仪仗功能的戈刀合体浑铸戟^[14](图三)。3.从埋葬环境看,在高等级墓葬中,卷首刀常与铜钺伴出,尤其是相同形制者成组或成对地分列墓内两侧,除盘龙城杨家湾PYWM11外,还有安阳花园庄M54^[15]、郭家庄M160^[16]、戚家庄M269^[17]、殷墟西区M1713^[18]、青州苏埠屯M8^[19]以及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C3M230^[20]等,其配属对象均为军事权贵,与铜钺一样是军权实力的标志。此外,安阳西北冈殷商王陵区祭祀坑M1355曾出土9件此类铜刀,与之共存有多具被斩首的人

骨架^[21]，说明它还是执行祭祀杀伐的刑具。

基于上述对青铜卷首刀的认识，我们可知在盘龙城杨家湾PYWM11中，与之成组件出的有刃“铜饰件”应是一对具有军权礼仪功能的兵器。这里顺便提及的是，吕学明先生通过观察该墓平面图，指出2件铜刀分别与2件铜鑄（PYWM11:15、56）位置相对可连成直线，由此推算出铜刀装柄、套鑄之后的总长度约为1.6米^[22]。实际上，15号标本在考古报告中定名为“镞”，56号标本定名为“鑄”，它们形制并不相同（图二），分别装配于形制相同的2件铜刀，会显得很不协调。因此，更合理的推测是1件装配于刀，另1件则装配于“铜饰件”。果真如此，则复原后的带柄卷首刀和“铜饰件”长度均为1.6米左右，这要比商代用于实战的带柄铜戈长度多出半米以上^[23]，彰显出礼兵的威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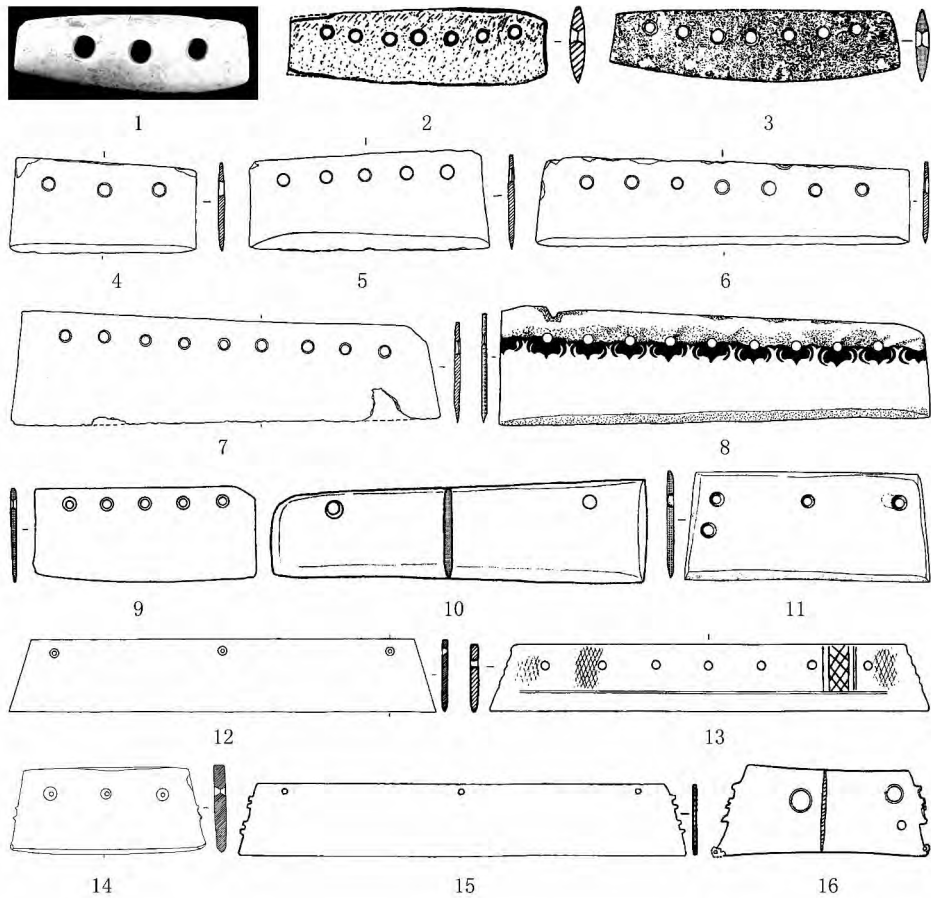
二、形制类比寻踪

既然盘龙城杨家湾PYWM11所出“铜饰件”是一对具有军权礼仪功能的兵器，那么该如何给其定名呢？它们整体呈扁平的长梯形，背窄刃宽，背上的三个基本等距排列的长方形穿当是用来穿绳缚柄的；一端宽一端窄，两侧边缘均饰相反的“3”字形扉牙。若不考虑器身上联排的镂空龙形图案，与其造型最类似的当属两侧饰扉牙的多孔玉石刀。

关于多孔玉石刀，以往曾有多位学者做过专门研究^[24]。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1.多孔玉石刀不同于先秦时期常见的有1或2个穿孔、用作生产工具的小型石刀，它们发现数量不多，形体较大，全长多在20厘米以上，最长者达65厘米，穿孔常见3、5、7奇数，有些多达9、11、13个，需要穿绳缚柄使用。2.多孔玉石刀的时空分布清楚，形制传承有序。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左右，多孔石刀率先出现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25]及其以东的金坛三星村遗址^[26]。它们两侧边近直呈扁薄长方形，中间略厚剖面呈梭形，既有3孔也有7孔，穿孔的排列基本与凸弧刃保持平行

略呈弧线，有的刃部可见使用痕迹（图四，1~3）。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左右，多孔石刀在南京以西的潜山薛家岗文化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多呈一端宽一端窄的扁平斜梯形，具有器形体量大，厚薄均匀，平刃且钻孔多为奇数呈直线等距排列的特点，甚至有的还沿穿孔施以朱绘花果纹带^[27]（图四，4~8）。作为薛家岗文化的代表性器类之一，多孔石刀向西分布到了鄂东南^[28]和赣北地区^[29]。在金坛以东的太湖流域，与北阴阳营文化年代大体相当的崧泽文化中还未见到多孔石刀的踪迹。直到良渚文化早期，多孔石刀开始现身，但是数量一直很零星^[30]（图四，9），且具有薛家岗文化石刀的形制特点，应是受其影响而出现的，不过并未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中，因而在良渚文化贵族墓中相当罕见。约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左右，多孔玉石刀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如陕北的延安^[31]和神木石峁^[32]、晋南的襄汾陶寺^[33]和芮城清凉寺^[34]、山东的日照两城镇^[35]和临朐朱封^[36]等遗址均有出土（图四，10、11）。除了石质外，更多采用玉质精雕细琢，器体趋于大型化、扁薄化，流行2或3孔，有的一端另钻1孔，5孔以上者很少见。到了二里头文化阶段，多孔玉石刀发展到了顶峰，不仅器大壁薄，而且多雕饰扉牙和规整的几何花纹，它们集中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37]（图四，12~15），其它地点尚未见到。商代早期以后，多孔玉石刀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3.多孔玉石刀基本上出自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如南京北阴阳营M131出土的2件形制相同的七孔石刀分置于墓主腰部左右两侧，与之共存有陶鼎、豆、罐、石镞、凿、砺石、玉块、加工猪獠牙以及猪下颌、鹿牙床及鹿角等^[38]。在潜山薛家岗墓地，多孔石刀常与玉石钺共存。在偃师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多孔石刀常与铜爵、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陶盃、玉钺、玉戈、玉柄形器等礼器伴出。由此可见，多孔玉石刀是一种极具身份等级象征意义的礼仪性兵器。

基于以上对于多孔玉石刀的了解，我们认为盘龙城杨家湾PYWM11所出“铜饰件”很



图四 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多孔玉石刀

1、2.金坛三星村M932:3、M609:5 3.南京北阴阳营M131:9 4~7.潜山薛家岗M47:11、10、5、8、M58:3 9.上海福泉山M40:79 10.襄汾陶寺M3015:49 11.临朐朱封M202:6 12~15.偃师二里头72 KM1:1、75 KM7:3、82 M5:1、87 M57:9 16.黄陂盘龙城PTZ:0328

可能是模仿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两侧饰扉牙的多孔玉刀而制作的。除了两侧饰以扉牙，还充分利用青铜材质的优点，在器身中部设计出联排相对的镂空龙形图案，更加凸显其礼仪功能。需要说明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年代间隔，如何模仿得到呢？以往有学者指出“（商代）二里冈已是一个不使用多孔玉刀的文化”，玉石戈是其主要的“玉兵”，推测那些年代被定为“商代二里冈期”的馆藏品大抵是由早期的多孔玉刀改制而成的^[39]。实际上，这种改制的多孔玉刀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考古人员在盘龙城北部的童家嘴就曾采集到过此类标本（PTZ:0328）^[40]，由白色带黄斑的蛇

纹石制成，呈扁平的斜梯形，背短刃长，背长16.5、刃长22、中宽8.2厘米，近背部两个较大的圆孔略有错落，右下侧有一个小圆孔，这种穿孔布局常见于龙山时代晚期的多孔玉石刀上，而两侧边缘各雕饰的两组扉牙则是二里头文化多孔玉刀的风格（图四，16）。这件“多孔刀”（报告定名为“璋”，不妥）被归入“盘龙城七期”，年代与盘龙城杨家湾PYWM11大体同时。由此可见，盘龙城杨家湾PYWM11所出“铜饰件”的创制并非空穴来风，而应是有所本的。

三、结语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盘龙城杨家湾

PYW11所出的2件“铜饰件”应定名为“刀”，是一对具有军权礼仪功能的兵器。此类梯形大刀虽与卷首刀同时出现，但并未像卷首刀那样持续延用到西周前期，似乎仅仅昙花一现，以至于被认为“迄今所见青铜器中尚无可比之器”^[41]。

不过，年代属于西周晚期或春秋初年的山东莒县西大庄96M1所出青铜大刀（96M1:19）^[42]在形制上与其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件铜刀直背，直刃，一端为斜边，另一端残，若采取对称复原，器体应呈梯形，残长35.2、宽7.6、厚0.2厘米，背上有窄条脊状直内用以嵌柄，脊状内下开一排5个横穿用以穿绳缚柄，沿脊状内两侧饰有对称的人面可以包贴柄面（图五），这种“翼耳夹秘”的设计亦见于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铜戈上^[43]。该墓虽遭村民取土破坏大半，但根据清理出的青铜戈、车马器、山字形铜器（鬯）以及缴回的鼎、簋、鬲、甗、盘、匜、壶、舟等14件青铜礼器判断，墓主应是一位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军事贵族，随葬的这件青铜大刀当是象征其身份等级的礼仪性兵器。

*本文系吉林大学基础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种子基金项目“考古视野下的早期中国青铜斧钺与王权研究”（项目编号2016ZZ025）的阶段成果。

注释：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以下引用盘龙城发掘资料如无另注，皆出自此报告。

[2]王立新：《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新果集——庆祝林允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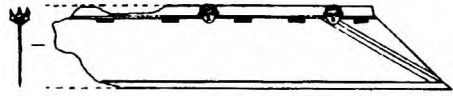
[3]李桃元、何昌义、张汉军：《盘龙城青铜文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4]拓古：《盘龙城与〈盘龙城〉》，《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此文后来收入《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5]考古报告第266页说“其中铜器35件，陶器9件，玉器4件，石器3件，绿松石3件，骨器3件”，但与随后介绍的器物分类统计数据并不一致（如铜尊、陶饼、绿松石饰等）这里以该墓平面图说明为准。

[6]蒋刚：《湖北盘龙城遗址群商代墓葬再探讨》，《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31页。

[7]32号铜钺中心圆孔较大，周缘鼓凸，内侧有一周凹



图五 莒县西大庄96M1出土的青铜大刀

槽，这种设计可能是用于容纳镶嵌物的。与其形制最相似者，是陕西洋县范坝村1979年出土的铜钺，半圆形钺身中间有一周围带凸缘的大圆孔，其内透雕一蛙纹；另1件于1964年出自城固五郎庙，大圆孔内透雕一龙纹（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9、167页）。由于这两件铜钺的年代约为商代晚期，它们很可能是受到盘龙城此类钺（杨家湾PYWH6也出土1件）的影响而制作的。此外，上海博物馆藏1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钺，中心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周亚：《上海博物馆藏镶嵌绿松石十字纹方钺观察》，《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因此，推测盘龙城此类铜钺的大圆孔内原来应有镶嵌物的，可能镶嵌物属于有机质类，因腐朽而未保存下来，今后在考古发掘现场应给予充分关注。

[8]除此之外，杨家湾村民邱富权的老屋基也发现铜勾刀1件，但报告未作公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9]李维明：《简论商代青铜刀》，《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

[10]刘一曼：《殷墟青铜刀》，《考古》1993年第2期。

[11]高西省：《商周长体刀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12]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吕学明：《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14]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19~33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17]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2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文物》1991年第3期。

[21]郭宝钧：《殷周的青铜武器》，《考古》1961年第2期。

[22]吕学明：《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

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23]井中伟:《夏商周时期戈戟之秘研究》,《考古》2009年第2期。

[24]饶惠元:《略论长方形有孔石刀》,《考古》1958年第5期。林巴奈夫:《中国古代的石庖丁形玉器与骨铲形玉器》,《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年。邓淑苹:《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三)——玉刀》,《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七期,1993年。杨美莉:《多孔玉、石刀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8年春季。

[25]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

[26]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金坛市博物馆:《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86~88页。

[2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

[28]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等:《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梅塞墩》,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29]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九江县沙河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30]如江苏江阴高城墩14座良渚文化墓葬中仅出土1件(南京博物院等:《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9页);上海福泉山30座良渚文化墓葬中仅出土5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73~74页);浙江桐乡新地里140座良渚文化墓葬仅出土1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1页);浙江遂昌好川80座良渚文化墓葬仅出土1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31]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年第2期。

[32]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期;《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三)——多孔刀》,《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七期,1993年。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年第3期。

[35]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41、249~250、341~34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38]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

[39]杨美莉:《多孔玉、石刀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8年春季。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36~437页。

[41]李桃元、何昌义、张汉军:《盘龙城青铜文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42]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考古》1999年第7期。

[43]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8~100页。

A Discriminate Analysis on So-called Bronze Ornaments Excavated in the Panlongcheng Site

Jing Zhongwei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The Panlongcheng site located at Huangpi district,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on the north shore of Yangtze River, was a city with strong military hues set up and ruled directly by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A variety of artifacts and remain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excavated sites. According to burial condition, shape comparis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function and denomination of two bronze ornaments unearthed in the grave (PYWM11) at Yangjiawan village. We do not believe they were not simply ornamental in nature, instead we argue that they were weapon knives utilized for military ceremonies. The trapezoidal knives and the head-curved knives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within the site assemblage, but the former were not continued to the early period of Xizhou Dynasty. It was only briefly used by the occupants at the Panlongcheng site.

Keywords: the Panlongcheng site, Bronze knife, Bronze weapo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责任编辑、校对: 陈丽新)